

## 被忽略的主角：重识缙紫之父淳于意

杨源哲 沈玮玮

**摘要** | 缙紫之父淳于意极具有医学天赋，早年间因生计和性格原因，以民间游医出道，但一开始就被迫进行政治投机，选择依附对象。在投靠刘兴居失败后，他选择了成为杨虚侯刘将闾的门客。医而优则仕，后来在刘将闾的推荐下任齐国太仓长，奈何因过于直接和功利的性格得罪权贵，遭到牢狱之灾。最后得益于小女缙紫之孝行和名医及官员的影响力，淳于意免除了肉刑之苦。否极泰来，不久因刘将闾成了新的齐王，他再次投靠刘将闾的门下，且地位日隆，迎来了人生的巅峰。虽然司马迁将他同扁鹊合传，然在太史公笔下，淳于意始终是一个贫寒出身的普通人通过处心积虑地政治经营，在大起大落的官场中努力谋求声名和权势的自私自利者。

**关键词** | 缙紫；淳于意；汉文帝；废肉刑；刘将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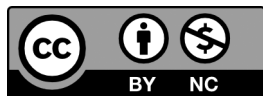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 | 杨源哲，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法学与知识产权学院讲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知识产权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沈玮玮：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地方法制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法律史。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西汉缙紫救父孝行感动文帝之故事可谓家喻户晓，然而学界对其父淳于意本人的了解则太过粗浅，尤其是法律史学界更是直接将其忽略。因淳于意医术高明，与扁鹊齐名，故而当前对淳于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医学史界。早期医学（史）界的研究者对淳于意的关注主要是为了厘清传统中医发展的脉络。<sup>[1]</sup>为了探究淳于意的精湛医术是如何获得及其在整个医学史上具有何种地位时，研究者们必须深入探究淳于意的人生经历，尤其需要对淳于意生平履历和社交关系进行细致考证和甄别。这是医学

（史）界关注淳于意的主要原因，只不过已有研究多有讹误，有必要重新检视。

淳于意的所有资料主要来自于司马迁的《史

[1] 主要研究成果包括：何爱华：《关于‘脉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载《上海中医药杂志》1958年第3期；宋向元：《祖国医学的病理起始问题》，载《中医杂志》1958年第7期。陈邦贤：《古代名医——淳于意》，载《中医杂志》1960年第2期。陈维、陈可冀：《略谈对医史人物的评价问题》，载《中医杂志》1962年第11期。何爱华：《试论淳于意（仓公）在脉学上的成就》，载《中医药学报》1980年第21期。

记·扁鹊仓公列传》。该传主要围绕淳于意案展开，即在淳于意获刑之后，小女缙紫为了让肤浅免受肉刑之苦而上书文帝，请求代父受刑，最终感动文帝，促使文帝废除了肉刑；文帝还向淳于意诏问了诸多淳于意行医的问题。淳于意借答诏的机会将其诊治的病案和盘托出。代父受刑、废除肉刑和诏问医案是司马迁为淳于意作传的三大内容，其中诏问医案占了较大篇幅。本文重点围绕司马迁的记载廓清当前研究的一些误区和模糊之处，重新梳理淳于意的人生阅历与社交圈子，试图将关注“缙紫救父”这一经典故事的视角从“缙紫之孝行”和“文帝废除肉刑”转向真正的主角缙紫之父“淳于意”，深化对缙紫救父及文帝刑罚改革之认识。

## 一、学医：成为名医的基础与优势

### （一）拜师学艺

淳于意的第一位师父是公孙光，公孙光在传授淳于意医术期间，曾预测并希望淳于意学成后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御医，《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了淳于意对恩师公孙光的点滴回忆：“公孙光间处，臣意深论方，见言百世为之精也。师光喜曰：‘公必为国工。吾有所善者皆疏，同产处临菑，善为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闻也。吾年中时，尝欲受其方，杨中倩不肯，曰若非其人也。胥与公往见之，当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给富。’时者未往，会庆子男殷来献马，因师光奏马王所，意以故得与殷善。光又属意于殷曰：‘意好数，公必谨遇之，其人圣儒。’即为书以意属阳庆，以故知庆。”在公孙光看来，“公必为国工”。<sup>[1]</sup>为了让其成为“国工”，便继续推荐到“同产”阳

庆身边学艺，恰逢阳庆之子阳殷前来拜访公孙光并想通过公孙光给齐王献马。于是，淳于意结识了阳庆的儿子。在公孙光亲笔信的力荐之下，淳于意得到了拜师公乘阳庆的机会。

“国工”即“医工”，在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中曾出土带有“医工”字样的铜盆，<sup>[2]</sup>医工主官为“医工长”，《后汉书·百官志》载“王国医工长”，本注曰：“主医药”。《汉书·武五子传》亦载“旦得书，以符玺属医工长”，颜师古注曰：“医工长，王宫之主医者也”。藩国仿朝廷官制设计，汉初的太医主治朝廷百官及宫廷之病，一般不能轻易离京，但兼有以下事务时例外：

（1）发生疫疾和灾害时，到民间救治。（2）传播下达经验良方于民间。身为太医不仅自由受限，危险系数极高，而且工作乏味，还不断消磨进取之心。<sup>[3]</sup>更不能接受的是，医官虽然有接近最高统治进而被提拔任用的机会，然薪俸极低。《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载太常“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六令丞”，王国仿中央亦设，王国最高医官称太医令，临淄封泥有“齐太医丞”印，说明汉初王国之太医有令有丞，后太医令改称医工长。<sup>[4]</sup>《二年律令·秩律》载：“太医、祝长及它都官长，……秩各三百石，有丞、尉者二百石，乡部百六十石。”此处“太医”即太医长，属“都官长”。<sup>[5]</sup>太医称长或是汉初制度，后改长为令。然《后汉书·百官五》载诸侯王之封国官职曰：“礼乐长、卫士长、医工长、永巷长、祠祀长，皆比四百石。”有分析认为不同时期秩级的规定不同所致。太医由长改称为令，秩级由低到高共同反映了汉代太医地位渐升

[1] 除特别标明外，文中所引均出自《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以下不再单独作注。

[2] 李光军：《汉代“医官”考》，载《陕西中医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

[3] 官医和民医的职业方式、医术可提升的空间、个人成就感和满足感皆不同。中国传统医学可区分为“正统”与“边缘”。“正统”以官医系统为代表，而草泽医人则属于“边缘”，正统与边缘群体在职业兴趣、技能提升和成就感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差别。参见廖育群：《繁露下的岐黄春秋——宫廷医学与生生之政》，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9-76页。虽然太医保存、收集和整理民间医学典籍以提高业务技能的机会，然民间的医方往往是秘而不宣的，朝廷收集自然不易，这是淳于意四处拜师学艺真诚求方的重要原因。参见焦培民：《汉代医疗保障制度初探》，载《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淳于意前后拜公孙光和公孙阳庆时，也均被告知“毋以教人”“慎毋令我子孙知若学我方也。”

[4] 李光军：《汉代“医官”考》，载《陕西中医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

[5] 万尧绪：《〈二年律令·秩律〉所见汉初的奉常》，载《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的变化。<sup>[1]</sup>即便如此,身为王国医工长,显然比太令六百石要低。名医阳庆“家富,善为医,不肯为人治病”,意味着除非因为贫穷迫不得已才会选择行医,因贫困而行医更不会把成为官医作为目标,因为官医薪俸太少,只有成为游医才有可能赚取更多。再加上当时医者乃贱业,于是,汉代医官主要来自征辟,<sup>[2]</sup>例如西汉名士龚胜曾言道:“窃见国家征医巫,常为驾,征贤者宜驾。”<sup>[3]</sup>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诏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sup>[4]</sup>综合而言,考虑到淳于意家贫,在学成之后是不可能达成师父的心愿进入官医行列的。为了养家糊口,“少而喜医方术”“自意少时,喜医药”的淳于意在学成之后选择了游医这一“贱业”来谋生并不为奇。一旦有了名气,淳于意又担心官府“拘除”征召失去自由和精进医术的机会,淳于意只能“不以家为家”,四处飘忽不定,自由执业。

## (二) 天赋技能

淳于意善于总结归纳,在拜师学艺过程中有两次自觉整理总结研究医方的记载,最早是在追随公孙光学医期间,“臣意深论方,见言百世为之精也”,此举深深打动了公孙光,于是公孙光亲自出面将其推荐到阳庆处学医。如公孙光所言,阳庆“善为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闻也。”第二次是在行游诸侯成为游医期间,在“善为方数者”“悉受其要事,尽其方书意”后,淳于意“及解论之”——对医方进行整理分析。这是淳于意从小便对“好方—试方—验方”颇感兴趣并能亲自动手的结果。例如淳于意在临床中逐渐认识到某些疾病或疾病发展的某一阶段不宜针灸,否则加重病情,甚至致死,《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便记载了淳于意所遇到的2例误灸致死医案,即曹山跗肺消痺误灸致死案和文王误灸致死案。<sup>[5]</sup>明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顾从德刻本《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后记”云:“今世所传《内经·素问》,即黄帝之脉书,广衍于秦越人、阳庆、淳于意诸长老,其文遂似汉人语,而旨意所从来远矣。”《黄帝内经》所引古经书名多有与仓公所读古医书相合。仓公拜师多人,其整理研究医经的成果极有可能被保留在《素问》等书中,这是淳于意能够成为名医的秘籍。

淳于意在汉初医疗市场能够独领风骚的核心竞争力则是从恩师阳庆那里学到的古医术,这种绝密且稀少的医术只有少数人才能掌握,主要包括脉书上下经、五色诊、奇咳术、揆度阴阳、外变、药论、石神、接阴阳禁书等古医书。阳庆认为淳于意之前所学的不值一提,甚至有害,故而让其“尽去而(尔)方书,非是也。”淳于意尤其继承了脉诊的优势,其治病“必先切其脉,乃治之”。在其诊籍记载的25例病案中,除2例用望诊,1例用尺肤诊法外,其余疾病的诊断均以脉象为依据。虽然其诊法内容尚不具体全面,但领先于马王堆医书,某些诊法与稍后出现的《黄帝内经》相当接近,甚至一致。<sup>[6]</sup>这些古医术经淳于意的实践和传播对后世医学产生了影响,成为《黄帝内经》理论的重要源头。<sup>[7]</sup>《黄帝内经》很可能是仓公的传人对先秦及汉初零散的医学篇章做系统的加工整理、修改补充而成。<sup>[8]</sup>淳于意还较早揭示了多样的病因,建议病患应当顺应天时,洁身自好,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才能恢复健康。<sup>[9]</sup>

## (三) 性格使然

在淳于意所奏对的25例病案中,以“断顺逆、决死生”为主要原则,若属顺证则治,治则有效;若属逆证(死证)则不治,但给出生存期以及各种症状,患者一般如期如症而亡,完全配得上“知人

[1] 郭俊然:《汉简所见的汉代中央官制杂考》,载《昆明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

[2] 高伟:《先秦两汉医官制度综述》,载《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3] 《汉书·龚胜传》。

[4] 《汉书·平帝纪》。

[5] 张永臣,等:《淳于意及诊籍针灸学术思想探析》,载《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6] 曾高峰、吴弥漫:《从〈史记·仓公传〉考察汉初诊法水平》,载《辽宁中医杂志》2006年第3期。

[7] 杨昉、包小丽:《从〈史记〉“仓公传”看〈黄帝内经〉的理论源头》,载《江苏中医药》2009年第11期。

[8] 吴弥漫:《从〈史记〉“仓公传”考证〈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和作者》,载《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9] 孙立亭:《从“诊籍”看淳于意病因及卫生思想》,载《管子学刊》1997年第2期。

死生，决嫌疑，定可治，及药论甚精”的评价。<sup>[1]</sup>其中，预测死亡而不予治疗9例，其中8例死亡，1例症状处于所预测疾病发展的某个阶段；预测死亡时间9例，其中5例死亡时间与预测相符，3例时间相近且死亡症状与预测相符，1例尚未死亡；治疗15例均有效；给予医嘱1例，患者未遵行后死亡，症状与预测相符。总之，淳于意的25例病案死亡的达10例，对此他竟毫不避讳，直接奏对，既不敢欺君罔上，又为自己留下余地，以防未来为皇亲国戚治病失败的风险。这是淳于意耿直诚实的性格使然，而这种性格极易得罪病患及家属。

从淳于意对医学的喜爱和耿直的性格来看，他当有医者仁心和救死扶伤的情怀，必然对患者是有求必应。甚至对那些未曾向他求医诊治的患者，淳于意都能主动诊治，并提前给出预防建议或重危病的警示。然而，他却因“或不为人治病”而遭到嫉恨。之所以不为人治病，一则是因为不敢治，不论治愈可否都会得罪患者，尤其是权贵者，后患无穷；二则是不愿治，尤其是遇到与自己意见相左且固执的病患，为其诊治反倒会被人背后议论。“不为人治病”便容易招致怨恨，遭受牢狱之灾。

## 二、入仕：投靠政治的行动与运势

### （一）一投刘兴居

按照汉初制度，列侯例不就国，功臣侯大都居住在长安，王子侯一般都住在王国的都城。<sup>[2]</sup>刘兴居（刘肥第3子）于公元前182年封为东牟侯后就久居长安，直到公元前180年吕后死后，居住在长安的刘兴居才能与兄长朱虚侯刘章作为内应为灭诸吕建功。而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高后八年，更受师同郡元里公乘阳庆。……受之三年，为人治病，决死生多验。然左右行游诸侯，不以家为家，或不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高后八年即公元前180年，恰好是刘兴居计划诛杀诸吕的时间，三年后，刘兴居因谋反自杀，此间应当都是淳于意在为其治病。因为他的病案记载提到了“故济北王阿母”，结合到后文对刘将闾称之为“齐王故为阳虚侯时”可以推测，“故济北王阿母”应当是济北王刘兴居的至亲——不论是母亲还是乳母。如果真是刘兴居的母亲，结合传记对“齐王太后”的称谓可知，在公元前180年到公元前178年期间刘兴居尚是东牟侯，并未获封济北王，只能使用“故

济北王阿母”而非“济北王太后”之称谓。

淳于意乃齐国首都临淄人，求学又在同郡，为给济北王阿母诊治不惜长途跋涉往来临淄和长安，可见二人关系在淳于意尚未成名之际就非同一般。淳于意能够与济北王搭上线，当有刘襄的推荐，而将淳于意推荐给刘襄很可能是第一位恩师公孙光所为。如前所述，公孙光期望淳于意成为御医，而且其与齐王交好。当时阳庆的儿子殷还想通过公孙光的关系向齐王献马。“会（阳）庆子男殷来献马，因师（公孙）光奏马王所，意以故得与殷善”。此事发生在淳于意拜阳庆为师之前，即不晚于高后八年。这一时期齐地仅有齐哀王刘襄一人。既为师徒，淳于意定然也会步入此社交层。有了公孙光的推荐，加上公孙光的榜样影响——并非御医但能结交权贵，既能自由生活，又能享受行医乐趣，淳于意在拜师阳庆后，尚未等到学成就已经积极为故济北王阿母诊治病情。只可惜淳于意早期选择的投靠对象刘兴居叛乱自杀，让他不得不寻找下一个政治靠山。考虑到济北王长期在长安经营，淳于意当时应该有试图通过济北王接近中央权力的“野心”。不过，这个关系应该在刘兴居叛乱自杀后就已经了断了，不可能为淳于意后来在文帝十三年受刑提供任何帮助。对济北国的熟悉以及考虑到刘将闾与后来获封的济北王刘志（刘肥第10子）非同一般的关系，淳于意在案结后再次应邀为济北王服务就顺理成章了。否则，济北王不可能专门召请淳于意“诊脉诸女子侍者”（类似惯例体检），济北王甚至还让太医高期、王禹跟随淳于意学医深造。

### （二）二投刘将闾

如果说淳于意早年看走了眼受刘兴居叛乱牵连是不幸的话，那么他并未畏惧退却，反倒利用游医之便积极寻找下一个靠山。于是，他在“左右行游诸侯”后暂时选择了身居杨虚侯国刘将闾（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刘将闾被封侯）麾下，还治愈了刘将闾所患的“痹”症。淳于意在刘将闾麾下的角色即是一个门客（食客）。正如有学者所言，

[1] 黄玉燕、翟双庆：《淳于意决死生方法探析》，载《吉林中医药》2009年第11期。

[2] 柳春藩：《秦汉封国食邑赐爵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9页。

历秦而在秦汉之际,中央集权的瓦解导致政治上的真空,这种客的活动更为发达。汉初去战国无远,此时的人们都曾切实感受到了前一时代的养客俗尚。<sup>[1]</sup>西汉初期,养客现象已十分普遍。诸侯王、中央及地方各层官吏介喜豢养门客,门客更是数量巨大。此时的门客阶层主要来源于士阶层,留有较高的阶级自尊。门客和主人的关系,仍一如战国时期,两者是平等的。客为主人助势,主人为客供衣食,主人对门客执谦虚之礼,<sup>[2]</sup>整个西汉门客和主人之间的关系是相对松散的,主客之间,以“义”为纽带自由结合,“和则留,不和则去”。<sup>[3]</sup>因此,淳于意之所以在“行游诸侯”时短暂停留在刘将闾身边,肯定是看中了门客不同于侍医的便利优势。

文帝对待门客的态度极有可能激发了淳于意闯荡官场的动力。苏轼曾言秦王之缘由,或是汉初采“举贤良”之任官制而将门客制度化的初衷:“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其谋夫说客,下至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靡衣玉食,以馆于上者,不可胜数。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皆有客三千人。度其余当倍官吏而半农夫。此皆役人以自养者,民何以支而国何以堪乎?苏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吾考之世变,知六国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盖出于此,不可不察也。”<sup>[4]</sup>陆贾、贾谊、晁错等皆是高祖、文景时代进入体制内的门客代表,亦是汉廷吸取秦亡教训之既得利益者。文帝即位之初只有通过培植和提拔亲信才能站稳脚跟,通过心腹举荐招揽门客纳入到汉廷官僚队伍便是绝佳之法:“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托于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朕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及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飭其任职,务省繇费以便民。朕既不能远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设备未息。”<sup>[5]</sup>

文帝“天下治乱,在朕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及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的观念,说明先秦时代主人对门客表面上的谦恭态度早已荡然无存,代之以君臣父子关系。陆贾等人的精神面貌,与春秋战国时代门客较狭隘的“知己”情结相比大为提高,尤其具有国家情怀和社会责任感,相较于秦代的则是进了一大步。史称“汉兴,诸侯王皆自治民聘贤”,<sup>[6]</sup>淳于意受此风影响便加入到门客的队伍中来。然而,汉初诸侯

王之门客品质完全不可与楚汉之际同日而语,更无法同帝王周围的谋臣相提并论,他们已经自降身价,成为投机、帮闲、告密者。例如梁孝王刘武“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东游士莫不至: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公孙诡多奇邪计,初见日,王赐千金,官至中尉,号曰公孙将军。”<sup>[7]</sup>枚乘、司马相如一度也在其间。这些人平时优游,侍主游山玩水,作赋写诗,造反时则出谋划策,事败后则或喊冤,或劝降,最后都作鸟兽散。淮南王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sup>[8]</sup>著名的门客有雷被、伍被、左吴等“八公”。这些人多是投机分子,刘安的两次谋反都是他们揭发。<sup>[9]</sup>或许正是文帝深知诸侯王身边的门客皆是此等之辈,对淳于意也就无太大兴趣。

史书并未记载淳于意具体侍奉了杨虚侯多久,但显然不是他的长久之计,最后选择回到临淄担任齐王刘则的太仓长。一是因为临淄为齐国国都,乃战国秦汉关东一大都会。《史记·齐悼惠王世家》载武帝时“齐临淄十万户”,汉初临淄人口应相差不远,对淳于意的医术传播和政治发展更有利;二是因为临淄是淳于意的故里,从安土重迁或衣锦还乡的传统观念而言,回归故里、光耀门楣、回报乡梓的决定在刘将闾看来十分自然。他定会支持淳于意的这一决定。于是,淳于意的角色发生了巨大改变,从边缘走向了中心,即从一名民间游医经门客最后成为中级官员。可惜淳于意再次失算,在试图兼顾兴趣爱好(成为医生为人治病)和人生目标(成为官员光宗耀祖)时却因过于直接和功利的性格得罪权贵,遭来牢狱之灾,于是有了著名的“缢紫救

[1] 沈刚:《秦汉时期的客阶层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95页。

[2] 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00页。

[3] 刘维宁:《略论两汉门客阶层》,载《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4] 《三苏文选·六国论》。

[5] 《史记·孝文本纪》。

[6] 《汉书·邹阳传》。

[7] 《汉书·文三王传》。

[8] 《汉书·淮南王传》。

[9] 张琼:《汉武帝应对侍从群体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8-10页。

父”之故事，这是他人生的第二次不幸。最后得益于小女缙紫之孝行和名医及官员的影响力，淳于意免除了肉刑之苦。

### （三）再投刘将闾

在文帝十三年因缙紫救父的孝行而幸免于难后，淳于意依然活跃在齐国民间医疗群体之中，为了防止狱灾再次降临，他必须重新寻找靠山。淳于意最迟是在刘将闾被封为齐王的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四月再次投靠到刘将闾麾下。在此期间，淳于意还应召去淄川国和济北国诊治病人。三年后，即文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61年），淳于意跟随齐孝王刘将闾入朝，顺带在长安还为安陵的项处治病。能够跟随诸侯王入朝的人员主要有三：（1）王国二千石官员必须尽从随行。据《汉书·哀帝纪》载：“令，诸侯王朝，得尽从其国二千石。傅、相、中尉皆国二千石，故尽从之。”（2）封国其他随从服侍、保卫诸侯王的官员。《史记·梁孝王世家》载：“梁之侍中、郎、谒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门，与汉宦官无异。”（3）如需其他人员随行，须经皇帝批准。《汉书·宣元六王传》载：“楚孝王嚣，甘露二年立为定陶王，三年徙楚，成帝河平中入朝，时被疾，天子悯之，下诏曰：……今王朝正月，诏与子男一人俱，其以广威县户四千三百封其子勋位广威侯。”<sup>[1]</sup>西汉宗室诸侯王定期朝见时间应该在冬十月。文帝朝凡四年1次应是当时常态，齐孝王刘将闾仅朝见了1次，即文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61年）。朝请等同朝聘，主要有“考文章”“正法度”<sup>[2]</sup>两大要事。“考文章”是天子考察诸王的才能与品性；“正法度”是天子奖励或惩处诸王以往的行为。除此之外，朝请还是宗室家族聚会，以表达“亲亲尊尊”之义。期间宴会歌舞，游猎驰射十分常见。朝请成了联络天子与诸侯王感情的重要媒介，可以巩固、修复二者关系，乃至阻止关系的进一步恶化。<sup>[3]</sup>在这样十分重要的场合，刘将闾将淳于意带在身边，极有可能得到了文帝的许可。淳于意将跟随刘将闾入朝时为安陵的项处治疗疾病作为典型回诏，以示宠爱之意。

因史料有关刘将闾的记载十分稀少，刘将闾和项处的关系便无法考究。从淳于意为项处诊断的病情可知，项处乃纵欲过度，且喜好蹴鞠，被视为史载首位死亡的铁杆球迷。《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载：“臣意谓之：‘慎毋为劳力事，为劳力事则必呕血死。’处后蹴鞠，要蹶寒，汗出多，即呕血。臣意复诊之，曰：‘当旦日日夕死。’即死。”秦汉爵位共二十等，项处为第八，是公乘爵位，乃中级官员（大夫），综合推断项处应是融入了贵族生活圈的积极分子。想必刘将闾入朝期间与文帝等娱乐，便邀请了项处作陪。淳于意偶遇了一同参加活动的项处小试牛刀，给刘将闾长了脸面。

## 三、心思：经营关系的治病与收徒

淳于意与文帝时期央地政治关系甚密，最早与最新关注此问题的研究当属白坤的《“缙紫救父”新考》<sup>[4]</sup>以及张朝阳的新近系列研究<sup>[5]</sup>。二人的研究均把关注点放在淳于意遭受肉刑以及缙紫救父和文帝废除肉刑的主题上，白坤的研究把淳于意案放到了吴王集团和齐系诸侯两股政治势力的交锋背景下，其认为文帝赦免淳于意不仅体现了汉初刑罚体制改革的基本精神，而且暂时稳定了吴王集团，为中央进一步争取齐系诸侯提供了可能。<sup>[6]</sup>张朝阳则认为《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录的这两个独立事件“废除肉刑”与“齐文王之死”之间存在某种关联，二者共同服务于文帝削弱诸侯王权的大战略。<sup>[7]</sup>就此而言，二人研究聚焦于淳于意的刑案上，从刑案来论证淳于意的政治关联或政治关系网，

[1] 李俊方：《汉代诸侯朝请考述》，载《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2] 《汉书·宣元六王传》。

[3] 王尔春：《汉代宗室问题研究》，吉林大学2015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32-134页。

[4] 白坤：《“缙紫救父”新考》，载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主编：《珞珈史苑》（2014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5] 张朝阳：《缙紫如何能救父：汉天子的软实力》，载《文史知识》2017年第8期，以及张朝阳：《〈史记·仓公列传〉探微：废除肉刑与齐文王之死》，载《中华文史论丛》2018年第1期。

[6] 白坤：《“缙紫救父”新考》，载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主编：《珞珈史苑》（2014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7] 张朝阳：《〈史记·仓公列传〉探微：废除肉刑与齐文王之死》，载《中华文史论丛》2018年第1期。

忽视了淳于意案发前后通过医者这一身份而逐渐构筑的政治关系图谱。若从病患和收徒两个方面对淳于意如何通过这一身份不断经营政治的过程进行追踪,对于全面透视淳于意的心思和目标,个性与追求当更有启发。至于白坤和张朝阳的结论是否正确,留待他文再做评论。

### (一) 普通病患:刻意迎合上意

如前所述,淳于意在跟随刘将闾入朝之时顺便给安陵公乘项处治过病,安陵为汉惠帝刘盈及其皇后张氏同茔异穴的合葬陵园。文帝以孝治天下,淳于意选择奏报为先帝陵之地的官贵治病,或有迎合文帝孝道之意。

淳于意选择上奏为齐国之外的另一平民安阳武都里成开方治病,亦有同样的用意。为成开方治病,表面上看是同医治安陵的项处之病一样,为了显示未卜先知的高超医术。然而,淳于意为何宁愿违背王命不为胶西王和济南王治病,反倒会前去安阳为平民治病?安阳,在今山东曹县东,文帝时当属梁国所辖。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封刘揖为梁王。前元十一年(公元前169年),刘揖坠马而死。在位十年,谥号为“梁怀王”。梁怀王是刘恒最小的儿子,宠幸异于他子。梁怀王刘揖去世无嗣,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改封嫡次子刘武为梁王。此后数年时间内,刘武多次入朝。《史记·梁孝王世家》载:“吴楚齐赵七国反。……梁孝王城守睢阳,……吴楚以梁为限,不敢过而西,与太尉亚夫等相距三月。吴楚破,而梁所破杀虏略与汉中分。明年,汉立太子。其后梁最亲,有功,又为大国,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四十余城,皆多大县。”经过多年经营,梁国成为西汉最强大的封国。文帝迫于压力而无法重用贾谊,但让贾谊成为梁怀王的太傅。在梁怀王坠马而死后,贾谊深自歉疚,抑郁而亡,足见贾谊对文帝和梁王的忠诚,亦可见文帝同梁王的感情,能将自己最信任的臣子侍奉左右。

成开方当为庶人,若其有爵位,司马迁定会如记载项处一样冠于“公乘”。淳于意选择了文帝之异母弟惠帝刘盈,以及最受文帝宠爱的梁王之地行医问诊,当有深意。文帝对二人应当情感非同一般,其皇位继承于刘盈,虽说不上感激,但应当对刘盈在位时积攒的治国资本表示认可。而且刘盈作为先皇,在文帝心中自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梁王自不必说,淳于意选择在此两地行医问诊,可谓抓住了文

帝的情感软肋,让他能够祭奠与怀念。同时,文帝向来仁慈,恭行仁孝,尤其体恤中下层民众,故而淳于意选择汇报了为中下级官吏和平民百姓诊治的病案,既能体现作为医者的仁心博爱,又与文帝一贯的仁政一致。

### (二) 特殊病患:积极支持主公

赵王、胶西王、济南王、吴王曾派人来邀请淳于意前去会诊,具体发生在何时不得而知。因为淳于意的回答只是针对文帝的诏问“意方能知病死生,论药用所宜,诸侯王大臣有尝问意者不?及文王病时,不求意诊治,何故?”我们不能仅凭此问题中人物的排序来认同早期研究者的判断,即赵王等人是在齐文王刘则患病之前使人来召淳于意而遭拒绝。此处“及”的用法应当是连接词而非时间副词。同样,淳于意答诏的“赵王、胶西王、济南王、吴王”顺序不能成为判定这些藩王召见淳于意治病的先后时间。这些藩王的召见应该是在淳于意稍有名气后。然而,淳于意为什么直言不敢听从这些藩王的召见呢?与之相距不远的东汉和帝时期名医郭玉道出了给权贵病患看病的无奈,想必也是淳于意的心声:“夫贵者处尊高以临臣,臣怀怖惧以承之。其为疗也,有四难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难也。将身不谨,二难也。骨节不强,不能使药,三难也。好逸恶劳,四难也。针有分寸,时有破漏,重以恐惧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犹不尽,何有于病哉。此其所为不愈也。”<sup>[1]</sup>

淳于意与其授业恩师阳庆不同,他在答诏时对比曰:“不知庆所师受。庆家富,善为医,不肯为人治病,当以此故不闻。”公乘阳庆之所以不闻名于齐诸侯,是因为不肯为人治病。而淳于意多次提到其不是不愿给人治病,而是不敢给人治病:“皆使人来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时,臣意家贫,欲为人治病,诚恐吏以除拘臣意也,故移名数,左右不脩家生,出行游国中,问善为方数者事之久矣。”就此而言,从淳于意答诏所言的内容来看,不存在司马迁主观认为淳于意获刑是因“或不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不为人治病”只是表象,其目的是选择性治疗。

在赵王或和吴王等藩王来召淳于意诊治时,淳

[1] 《后汉书·方术列传下》。

于意应该已经摆脱了生活的窘境，而且寻找到了靠山杨虚侯刘将闾。即便无法判断赵王和吴王召见淳于意的具体时间，但如果二王是在淳于意行游诸侯之际征召淳于意的话，正在为“功名”和“利禄”都发愁的淳于意不至于“不敢前往”。与此同时，在齐文王刘则最初有意时，淳于意只是一名没有名气的游医，文王当然不会召见淳于意诊治。

如果赵王和吴王的邀请是在淳于意已经担任齐国太仓令之后，身为齐国正式官员的淳于意更不可能前去，否则便会给齐王刘则带来私下联合赵王和吴王的嫌疑，已经被文帝盯防的齐王刘则必然对这一很可能被视为“不忠”的证据十分反感。

胶西王和济南王获封均在淳于意案结之后，此时淳于意已经再次依附到新任齐王刘将闾的门下，然而，淳于意为何又对济北王和淄川王的邀请欣然接受呢？这主要与刘将闾有关。“胶西王”和“济南王”很可能与刘将闾关系不和，而让淳于意不敢或不能前往。济北王和淄川王或与刘将闾关系甚好，故而淳于意乐意效劳。在淳于意诏对所提及的25个病例中，有4个与济北王有关，2个与淄川王有关。此外，济北王遣太医高期和王禹、淄川王遣太仓马长冯信都来向淳于意学习医术，这说明了齐国个别王族间的联系比较紧密。有学者认为这种来往视血缘远近而有别，齐国、济北国、菑川国三国间的交往似乎更多，可见三王之间关系非同一般。<sup>[1]</sup>而刘将闾同胶西王、济南王，以及赵王和吴王等关系一般甚至较差。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联合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等刘姓宗室诸侯王发动七王之乱。济北王刘志被胁迫参与叛乱，后坚守不发兵，所以赦而未杀。在齐地，胶西王、胶东王、淄川王围攻刘将闾的国都临淄，《史记·齐悼惠王世家》载：“胶西、胶东、菑川、济南皆擅发兵应吴楚。欲与齐，齐孝王狐疑，城守不听，三国兵共围齐。……汉将栾布、平阳侯等兵至齐，击破三国兵，解齐围。已而复闻齐初与三国有谋，将欲移兵伐齐。齐孝王惧，乃饮药自杀。景帝闻之，以为齐首善，以迫劫有谋，非其罪也，乃立孝王太子寿为齐王，是为懿王，续齐后。”胶西、胶东、淄川、济南王想拉拢刘将闾共同谋反，应是淄川王从中游说，但参与谋反的还有与刘将闾不和的胶西王和济南王，这应该是刘将闾最初“狐疑”，一面

秘密与叛军进行和谈，一面观望汉廷战况的原因。刘将闾之所以愿意同叛军密谋，是因为考虑到淄川王也参与了反叛的关系；而刘将闾之所以还观望并对汉廷抱有希望的则是因为反感与胶西王和济南王等人为伍参与叛乱。另外，当刘将闾得知济北王尚是被胁迫参与叛乱但不发兵参战时，更会犹豫不决。“一母生九子，连母十个样”，在齐悼惠王刘肥的13个儿子中，刘将闾和济北王、淄川王关系最好，而与胶西王和济南王等则关系一般甚至有交恶的可能。这就是听命于刘将闾的淳于意，为何能给济北王和淄川王服务却不敢为胶西王和济南王服务的原因。

淳于意选择是否为其他藩王服务也有自己独立的判断。例如淳于意最早是求学菑川唐里的公孙光，因此能够为淄川王看病或有回报师父故里的情感考虑。淄川王事后还派遣与淳于意同属太仓系统的太仓长属官马长前来跟随他学医。淄川王当然会考虑到二人同属太仓系统这层关系。此外，有学者精确分析了近两千方出土于汉初齐国临淄刘家寨的封泥，齐国疆域内的582方封泥可以反映齐国的地理形态，如果将齐内史（临淄）视为王畿，齐内史加济南、胶西二郡之地便可视为“大王畿”，济北、城阳、胶东、琅邪四郡之地则属边陲。同时，有67方封泥分别来自齐国之外的二十四个县及侯国，遍及汉廷及其辖郡、淮南国、赵国、代国、淮阳国、梁国、楚国等地，然其数量远少于齐国国内的封泥，反映了汉初齐国对内往来的频率远高于对外。<sup>[2]</sup>故而对临淄熟悉的淳于意较多了解胶西王和济南王，这两地与临淄接壤，有关胶西王和济南王的信息比较容易获得。因齐国同其他国交往不够，淳于意也就无法获知赵王和吴王的具体消息，前去诊治大有风险。

### （三）六大徒弟：主动搭建关系

西汉初年，拜师学医必须要有同乡之谊或熟人推荐，淳于意的第一位恩师乃是与家（临淄）紧邻的（淄川）公孙光，第二位恩师则是公孙光

[1] 王浩：《〈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所见汉初二三事》，载《文史知识》2009年第12期。

[2] 游逸飞：《汉初齐国无郡论——战国秦汉郡县制个案研究之三》，载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编辑委员会编：《历史地理》（第三十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极力推荐的阳庆,恰好又是淳于意的同乡。因阳庆不为人治病,淳于意在公孙光推荐之前应当不知道同乡还有此高人。医术、占卜、律令和写史技术都是“传内不传外”“传熟不传生”,<sup>[1]</sup>无怪乎淳于意的恩师公孙光要嘱咐道“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与公,毋以教人。”公孙光一方面破例“妙方悉授”,另一方面又再三叮嘱“毋以

教人”,淳于意也保证“死不敢妄传人”。同时,阳庆叮嘱道“慎毋令我子孙知若学我方也。”然而,淳于意后来却违反收徒禁忌,曾广收门徒,打破了医方秘而不宣的江湖规矩。先后有宋邑、高期、王禹、冯信、杜信、唐安等6人拜师学艺(齐人宦官平因为兴趣只是时常向淳于意讨教,不是正式的徒弟)。(见表1)

表1 淳于意收徒学艺基本情况表

姓名	籍贯	官居何职	何人推荐	所学内容	学习时间	学成与否	去向	淳于意在公孙光处所学	淳于意在阳庆处所学
宋邑	临淄	平民	同乡(不知何人)	五色诊	一年多	成	未知	受方化阴阳及传语法(口头流传的医学理论)	受其脉书上下经、五色诊、奇咳论、揆度阴阳外变、药论、石神、接阴阳禁书(三年学成)
高期、王禹	济北	官(济北国太医)	济北王	经络、针灸	一年多	成	原济北国太医		
冯信	淄川	太仓马长	淄川王	切脉之法,医方(汤药)	一年多	成	原淄川国太仓马长,当晋升为淄川王侍医		
杜信	高永	家丞	高永侯	五色诊	两年多	成	继续为家丞,并兼任侍医		
唐安	临淄	平民	同乡(不知何人)	五色诊、奇咳论、四时阴阳学	未知	未成 <sup>[2]</sup>	除为齐王侍医		

以上6人中有济北王和淄川王推荐,以及同乡的宋邑和唐安——既为同乡,很可能也有关系推荐。司马迁提到的“高永侯”家丞杜信应当与齐王有关,没有这一层关系杜信是没有机会拜师于淳于意的。《汉书·百官公卿表上·爵》载:“列侯,改所食国令长名相,又有家丞、门大夫、庶子。”列侯家臣,掌侍侯,理家事,乃高永侯之心腹。遍查《史记》《汉书》等文献,并未查询到家丞杜信所属的高永侯所为何人,可能是司马迁笔误所致。因《史记》所载并无“永”字侯,以“高”字为首且与齐国有关的文景之“侯”只有高乐侯(史失其名),乃刘将闾之子,封年不详。若是刘将闾之子的家丞,自然能得到淳于意的关照。

淳于意能够收济北王和淄川王推荐的人为徒,则是因为此前为济北王和淄川王展示过医学才华。淳于意曾为济北王及其侍女看过病,当时济北王自认为女侍者竖没有病,淳于意竟能够发现病症,真正见识到了“未卜先知,能决生死”的高超医术。济北王的众医们因判断病因有误,对女侍者韩治疗不当。于是,济北王便派遣太医二人跟随淳于意进修学医。淳于意向二位太医传授的内容是“经络高下及奇络结,当论俞所居,及气当上下出入邪逆顺,以宜鑱石,定砭灸处”,主要是判断经络正常和异常运行之状,以及恰当选用砭石和针灸来治疗。济北王的众侍医之所以对女侍者韩的病因诊断有误,是因为对经络的运行把握不好。淳于意在为济北王

治病时,则是根据“气当上下出入邪逆顺”来判断病因再对症下药。因此,淳于意教徒也是因材施教。同样,淳于意为淄川王及其美人治疗过疾病,二人在有症状后经淳于意针灸穴位和服用医药而痊愈。淄川国恰有同样供职于太仓的冯信喜好医方,于是被淄川王发现派遣到淳于意身边学医。冯信与淳于意供职同一系统,有共同语言,便于速成。淳于意当然明白淄川王的用意,其所授之技乃治愈淄川王及其美人之疾时所用,这样方便冯信学成之后回国复命,且易被淄川王认可有机会升迁。就此而言,淳于意对济北王和淄川王所派习医之人并非悉数传授,而是有所保留,确保二王在必要时还能再找上门,以形成持续的影响力。

[1] 此类特殊技能的职业多为世袭,被称为“畴官”,尤其是专业性较强的领域,太史、巫医、司空、司徒等。司马迁之所以成为史官,乃继承其家族传统。《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2] 司马迁在《史记》中仅记载了唐安“未成”,其他5人应当学成。

淳于意再次投靠了刘将闾，为其他藩王治病定需先征得刘将闾的同意并向其详细汇报。其他藩王遣人来拜师学艺，淳于意更会先征询刘将闾的意见，这也更能印证刘将闾与济北王和淄川王关系亲近，而与胶西王和济南王不太往来。当然，淳于意收徒并非完全以刘将闾的好恶为标准，他还有自己的主见，收平民宋邑和唐安即是如此，这应该是他“诚恐吏以除拘臣”的性格使然。

在淳于意所收的6个弟子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最后一个徒弟唐安。唐安为淳于意同乡，尚未学成就被安排了去处——齐王侍医，这背后定有淳于意的推荐。此处的齐王指的应该是刘将闾。如果是指齐文王刘则，唐安跟随兼职的民间游医淳于意学医还未学成，完全不可能被“察举（征辟）”为“侍医”。有学者认为唐安正是酿成了齐文王之病故的元凶，故而在刘则去世后，齐王家族要上告淳于意，作为师父要承担连带责任，“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sup>[1]</sup>这一判断与事实出入甚多，唐安极有可能是截止答诏时淳于意所收的最后一个徒弟，甚至是淳于意生平最后一个徒弟，故而尤为器重。因为当时淳于意名下只有6个徒弟，不可能遗漏或记错，毕竟淳于意收徒已经违背了公孙光的“师训”且犯了当时学医的禁忌，定会十分谨慎。从淳于意向唐安传授的内容来看，也是较前面的5人为多。如果说济北王、淄川王和高永侯所派之臣都有一定的医学功底，只是来淳于意身边进修的话，那么同样是平民的宋邑只在淳于意这里学习了五色诊，可见淳于意对唐安偏爱有加。对比淳于意在公孙光和阳庆处所学的内容来看，淳于意几乎是将最重要的内容全部传授给唐安，而且是按照阳庆所传授的顺序来教学。唐安尚未学成（在淳于意看来，没有学完他所规划的全部内容，就等同于“未成”）很可能不是天生愚钝——否则淳于意不会收其为徒，更不会悉数传授全部知识，而是出现某种重大变故，让淳于意感觉到已经无法等到唐安学成便要尽快将其推到齐王侍医的位置上。在淳于意看来，只要掌握了前三种医术（五色诊、奇咳术、四时阴阳学）完全可以成为医生——其他5人所学已经足够应付日常需求，至于“药论（方剂术）、石神（针灸术）、接阴阳禁书（房中术）”在成为侍医后再学也不迟。淳于意甚至都没有提及唐安到底跟随他学医多久，如果有了唐安学艺的时间，我们就更能推测二人之间非同一般的关系——淳于意很可能把唐安认定为

接班人。这可能是淳于意主动不提唐安跟随自己学艺多久的原因，以免过早暴露心迹。

淳于意当时正在刘将闾麾下效力，经历肉刑官司后，不再公开行医，担心再次被人上书。很可能为避免风头，只能让徒弟唐安走到前台，自己退居幕后掌控局面。徒弟即便尚未学成（学完），只要师父背后指点则完全可以胜任侍医一职。凭借淳于意在新任齐王刘将闾得宠之势头，为了身后计，他便极力推荐尚未学成的徒弟唐安进入齐王御医行列。

虽然侍医在医官群体中并不显眼，但便于淳于意背后操作。所谓的侍医，即服务于朝廷或王国却无官阶，又隶属于太医令（丞）的医生，汉宣帝之际尚出现有女性侍医淳于衍，<sup>[2]</sup>然太医令（丞）为掌宗庙礼仪奉常之属官，应当不会让女性担任，故而侍医地位最低。《汉书·百官公卿表》《后汉书·百官》对“侍医”均无说明，可见其并无官阶。在汉代中央控制住地方后，侍医在地方官职中便消失了。<sup>[3]</sup>正是因为侍医微不足道，非不得已并不被史家所关注，除了《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所载齐王侍医遂和唐安之外，详考《史记》《汉书》所载“侍医”仅有六处。（见表2）

表2 《史记》《汉书》所载“侍医”情况表

侍医姓名	记载内容	出处
夏无且	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	《史记·刺客列传》
淳于衍	显前又使女侍医淳于衍进药杀共哀后，谋毒太子，欲危宗庙。	《汉书·宣帝纪》
李柱国	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	《汉书·艺文志》
无	疾病侍医临治，赖陛下神灵，不死而活。	《汉书·王贡两龚鲍传》
无	加赐黄金百斤、养牛、上尊酒，太官致餐，侍医视疾，使者临问。	《汉书·匡张孔马传》
伍宏	前东平王云与后谒祝诅朕，使侍医伍宏等内侍案脉，几危社稷，殆莫甚焉！……今云等至有图弑天子逆乱之谋者，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务聪明以销灭未萌之故。	《汉书·何武王嘉师丹传》

侍医虽不起眼但有机会侍奉当权者，有机会崭露头角，容易获取信任而提拔任用。侍医还有另一种意思，根据《汉书·佞幸传》载伍宏之事迹所载：“前

[1] 《三字经·全文》。

[2] 《汉书·宣帝纪》。

[3] 姜辉：《先秦及秦汉时期医官称谓考》，载《中华文化论坛》2011年第2期。

东平王云贪欲上位,祠祭祝诅,云后舅伍宏以医待诏,与校秘书郎杨闳结谋反逆,祸甚迫切。”其中使用了“以医待诏”之表述,“待诏”即指一些特殊人才被征召入朝,随时听候皇帝传唤咨问,并非官职,因此,“待医”按字面理解,即侍候在帝王身边随时听诏的人。淳于意也是“以医待诏”,享有一定的自由,但又不完全受拘束,而且能够倚重藩王权势,深受器重,这可是恩师公孙光的人生道路。

有研究者认为春秋战国至秦汉时代,医学分两大派。最初是秦派,而后代替秦派的为齐派,如阳庆、淳于意等。齐派医学包括两个学术共同体,分别以扁鹊、仓公为核心,他们均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基本固定的医技操作程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传承谱系。<sup>[1]</sup>总之,淳于意从台前退居到幕后,培养了几位高足,形成了被医学(史)界誉为的齐医学派,在整个齐系诸侯势力范围内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 四、医者:相较于扁鹊的盖棺定论

淳于意既然寻找到了靠山刘将闾,且一旦进入官场对行医便多有限制,那么为何又愿意离刘将闾而去回到临淄成为齐王的太仓令?除了可能有故土情结之外,还与淳于意的人生抱负有直接关系。早在向阳庆拜师学艺之时,淳于意就小试牛刀,为故济北王阿母诊治病情,借机进入官场。作为淳于意的晚辈,汉成帝之际的楼护父子便是典型:“楼护,字君卿,齐人。父世医也,护少随父为医长安,出入贵戚家。护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长者咸爱重之,共谓曰:‘以君卿之材,何不宦学乎?’由是辞其父,学经传,为京兆吏数年,甚得名誉。是时王氏方盛,宾客满门,五侯兄弟争名,其客各

有所厚,不得左右,唯护尽入其门,咸得其欢心。”<sup>[2]</sup>

当时西汉齐地依然是医学中心,直到西汉末年,齐地医术在全国仍有盛名。<sup>[3]</sup>淳于意是否出自医学世家已经无从可考,但淳于意善于总结归纳,精于融通的才能不在楼护之下。只不过楼护有“楼君唇舌”之美誉,善于沟通,处事周到;淳于意则过于直接,虽不太会说话,但并不妨碍他结交诸侯。楼护同样是王侯的座上宾,早年虽是京兆小吏,因结识汉成帝母舅王谭、王根、王立、王商、王逢这五位同时被封侯的“五侯”,经平阿侯王谭举荐为方正,出任谏大夫,后被王莽封为息乡侯,位列九卿,最后遭受牵连被免为庶人。淳于意和楼护同为齐人,又精通医药,由医入官,大起大落,其经历极其相似。与楼护一样,结合汉代察举制,淳于意从刘将闾的门客跃居到齐国的太仓令这一重要职位,应当得益于刘将闾的推荐。

“医而优则仕”,淳于意为官之举与其性格有巨大关系。司马迁将扁鹊与仓公合传,让我们有机会在对比中感受二人性格和抱负的极大反差,由此也可参透太史公对二人的评价之因。太史公曰:“女无美恶,居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疑。……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sup>[4]</sup>岂谓扁鹊等邪?若仓公者,可谓近之矣。”扁鹊是名副其实的民间游医,从不依附于任何政治权势,且能“随俗为变”为各地庶民诊治疾病,不能算是“美好的不祥之人”。他只是因为医术高超而被人嫉妒暗算。淳于意则不同,他的终极目标便是成为王侯的座上宾,是司马迁所谓的真正的“美好者”。既然淳于意与政治牵连过甚,司马迁为何还认为他“匿迹自隐”呢?最合理的解释便是,淳于意只甘愿“被”(刘将闾)匿迹自隐,而且在刘将闾的庇护下广收门徒,积极介入政治,努力编织一张

[1] 陈直:《玺印木简中发现的古代医学史料》,载科学史集刊编辑委员会:《科学史集刊》(第1辑),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8-76页;俞慎初:《中国医学简史》,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56-57页;何爱华:《齐派医学简论》,载《管子学刊》1990年第1期。

[2] 《汉书·游侠传》。

[3] 孙家洲:《论齐鲁文化在汉代学术复兴中的贡献》,载王志民主编:《齐鲁文化研究》(第三辑),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4] 《老子》第三十一章直言道:“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美好”二字最初来源于《庄子·盗跖》所载孔子之言“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长大,美好无双,少长贵贱见而皆说之,此上德也;知维天地,能辩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众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称孤矣。”“美好”与“不祥”并未在道家著作中连用,或为司马迁之伪注,虽然也存在司马迁所参阅的《老子》版本与今人发现的版本不同的可能,但司马迁之所以借道家之言来评价仓公,或是为了迎合文帝信奉黄老之学的缘故。

庞大的医疗网络。淳于意“匿迹自隐”在刘将闾处，颇像武帝之际的董仲舒。史载“故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大狱，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sup>[1]</sup>汉代的隐士普遍隐于民间，他们多是在自己的故乡或是四处游走，以占卜或传教等方式生活，但董仲舒致仕之后并未就此彻底隐退，而是迁居到长安的一条陋巷，以讲经传教的方式继续活跃在首都思想圈，以维持儒家持续的影响。<sup>[2]</sup>淳于意与董仲舒一样，并非真的想彻底远离世俗，而是以退为进，维持已有的影响力。

正所谓“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淳于意并非能如同扁鹊一样堪当大任，由于出身贫寒，还有五个女儿尚待抚养，只能在拜师学艺之初就开始行医；学成之后，为了生计四处行医贴补家用——四处行医能够赚取更多的诊金，获得更高的声名，与此同时提高医术，收集民间偏方，日益精进，最后暂居在刘将闾门下，终于达到了衣食无忧的第一个人生目标。尽管医术高超，但医德堪忧，无法同扁鹊齐名，从淳于意嫌弃生女无用的记载开始，一直到最后文帝诏问其从医历程，司马迁笔下的淳于意都是一个出身微寒的凡人不惜一切手段投机经营，利用一切资源尽可能获得声名和权势的自私自利者。淳于意并未真正感受到文帝当政时儒家思想的影响，故而非儒医也。

从文帝事后诏问淳于意的内容来看，文帝似乎没有让淳于意为自己诊治过疾患，因为他对淳于意高明的医术并非完全了解，这说明淳于意的医术一

直被刘将闾“私藏”，此乃太史公评价淳于意“匿迹自隐”的原因，否则文帝不可能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藩王官员或者门客如此上心。根据司马迁的记载，文帝诏问淳于意的核心问题便是“所为治病死生验者几何人也，主名为谁。”且一再追问“所诊治病，病名多同而诊异，或死或不死，何也？”“所期病决死生，或不应期，何故？”“诊病决死生，能全无失乎？”既然淳于意如此了得，为何未能救齐文王的命？于是，文帝特地问道：“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状？”之后，文帝还问道：“师庆安受之？闻於齐诸侯不？”此句意味着文帝欲了解淳于意选择性为王侯治病是否是遵循师训，淳于意的回答很有意思：“庆家富，善为医，不肯为人治病，当以此故不闻。”阳庆师父甚至告诉淳于意“慎毋令我子孙知若学我方也。”师徒二人竟然如此不同，文帝愈发怀疑如此低调的阳庆竟然能收淳于意为徒？于是继续问道：“师庆何见於意而爱意，欲悉教意方？”淳于意道出了原因：一是因为公孙光的推荐；二是因为给阳庆献出了中医秘方。可见，身为富人的阳庆对秘方的喜好甚于治病，他所追求的是钻研医学，对金钱和名誉并不在乎。相比师父的过于低调，贫穷的淳于意则要高调许多。他不仅违背师训广收门徒，而且还行游诸侯，与权贵结交，积极经营政治，一旦时机成熟便弃医从政。纵观淳于意的人生际遇，时代之背景始终不能忽视，在儒家尚未掌握统治话语权的西汉早期，医者的定位（或者自我价值）似乎只有通过“他视角”（依附他人，得到认同和肯定）才可得以展现。<sup>[3]</sup>

附表：淳于意履历表

时间	经历
高后八年（公元前 180 年）前	跟随公孙光学医
高后八年（公元前 180 年）	跟随公乘阳庆学医
文帝三年（公元前 177 年）	开始行医
文帝三年—文帝十三年（公元前 177—公元前 167 年）	期间就任齐太仓长，并四处行医，授人医术。
文帝十三年（公元前 167 年）	被人上书言罪，逮至长安领受肉刑，经小女缙紫上书，终因文帝废除肉刑而得救。
文帝十三年—文帝十六年（公元前 167 年—公元前 164 年）	回到齐地。
文帝十六年（公元前 164 年）	随阳虚侯入朝，诊治安陵项处等病，答汉文帝召问。
文帝十六年（公元前 164 年）后	再无淳于意及其家族记载。

[1] 《后汉书·应劭传》。

[2] 沈玮玮：《西汉司法：法儒两家的多轮交锋——董仲舒春秋决狱的背后》，载《人民法院报》2016 年 4 月 29 日。

[3] 于赓哲：《分层时代的研究——汉宋之间医疗史研究的视角问题》，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1 期。